

陇上英烈——保至善

□ 牛旭东

四

1926年,随着北伐顺利进军,工农运动蓬勃发展,国民党新右派相继制造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等事件,刻意制造摩擦,排挤打击共产党人。1927年初,甘肃的国共统一战线面临严重的危机,国民党右派极力排斥共产党员的革命活动,最终导致了公开对抗的“皖江会馆械斗事件”爆发,中共甘肃特支遭到反动当局破坏,特支书记张一悟等同志身份暴露,遭到了当局通缉,特支工作陷入瘫痪。同时,国民党甘肃党部右派与左派斗争激烈,国民党在甘肃的党务工作亦陷于混乱。

1月底,中共陕甘区委通过时任国民联军政治部主任的共产党员刘伯坚派保至善以“西北政治委员会特派甘肃省党部党务委员”的身份到甘肃整顿党务,伺机重建党的组织。同他一起前往的还有在西北“国民联军”总政治部工作的胡廷珍、在西安暑期学校任教的马凌山和王孝锡三名共产党员以及马凌山的表弟、进步青年雷鸣夏(雷伟哉)。2月初,保至善一行5人雇了辆马车从西安启程。当时春节刚过,尚是冬天,一路上冰天雪地,行走困难。特别是过六盘山时,山路陡峭,即使空马车也只能在中午冰雪消融之时才能走一阵,人不得不在冰雪泥泞中步行。这一走就是二十多天,直到2月底5人才到达兰州,住进了国民党甘肃省党部,并迅速与中共甘肃特支书记张一悟取得联系。

1927年3月的一个晚上,兰州地区的中共党员齐聚后街十六号租赁的三间堂屋内开会。会议由甘肃特支书记张一悟主持,他分别介绍了保至善、胡廷珍、马凌山、王孝锡,并说明了四人的来意。胡廷珍代表四人谈了整理党务的意见:“在路线方面,我们要坚持与国民党左派作团结合作,反对分裂,但是要同国民党右派作坚决的斗争。因为右派反俄反共,是反动派,不能代表革命人民的利益,所以要和他们作斗争,孤立他们。为了解决党务纠纷,拟将两个市党部全部解散,重新进行登记,要使右派在登记中失败;动员各厅局机关负责人带头加入国民党,选出兰州市的执行委员会;拟以国民党左派的身份,成立国民党甘肃省党部。对这个权力机构,一定要

把领导权掌握在国民党左派手里,同时,要很快的把广大群众组织起来,成立农民协会、各行业协会、妇女协会、青年社……现在国共合作,形势很好,北伐军占领武昌、南昌后,工人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收回了汉口九江等英租界,革命势力已经发展到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人民革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在宣传方面,既要宣传共产主义,也要宣传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大量发行进步书籍报刊。”会议开到深夜才结束。保至善、胡廷珍、马凌山、王孝锡四人的到来,使兰州的党员欢欣鼓舞。在中共陕甘区委的领导和指示下,他们确定了当时的工作任务,进一步明确了斗争的目标和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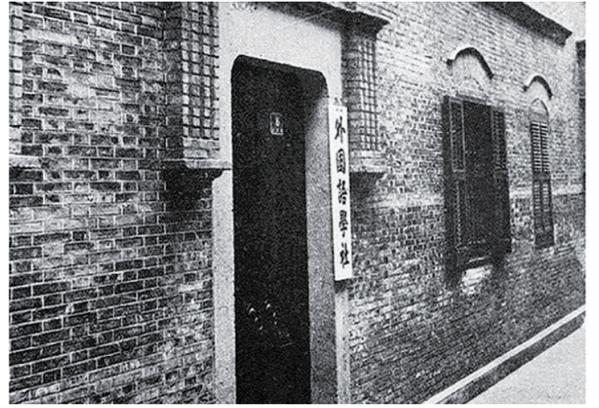
目标既定,保至善四人便迅速着手整顿国民党甘肃党务。为了迅速打开工作局面,努力排除国民党右派的干扰和破坏,整顿工作先从兰州市党部开始。很快新旧两个市党部的牌子被取下,同时解散,所有党员重新进行登记。在登记过程中,国民党右派分子大多被淘汰,各厅局的公务人员在厅局长带领下集体加入国民党,在此基础上选举产生了国民党兰州市党部执行委员会。在整顿兰州市党部的有利形势下,又进一步成立了国民党甘肃省党部,时胡廷珍任组织部长,马凌山任宣传部长,保至善任农工部长,王孝锡任青年部长,陈仲骏(共产党员)任妇女部长,其他各部由国民党左派人士任职。另吸收了一批进步青年、工人和农民代表加入省党部,保证了国民党甘肃省党部成为一个以共产党为核心的具有革命性的党部。省市党部成立后,对内每周都要召开会议,介绍革命形势,研究当前开展的工作。对外则印发各类革命传单和文件,组织群众集会,宣传革命道理,启发群众思想觉悟,在保至善等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在推动兰州农民运动蓬勃发展,掀起反帝爱国运动高潮、宣传革命思想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了适应新形势下革命斗争的需要,保证和加强党对革命运动的领导,针对中共甘肃特别支部领导机构不健全的实际问题,1927年4月17日,中共兰州特别支部(简称兰州特支)成立大会在下沟召开。参加会议的有胡廷珍、王孝锡、马凌山、保至善、张

一悟、贾宗周、王陶、姜屏周、韩芝惠、谈仲瑜、邱纪明等共产党员。会议宣布成立中共兰州特别支部,由胡廷珍任书记,王孝锡负责组织工作,马凌山负责宣传工作,保至善负责农工工作。会上,保至善等人都依次发表了讲话。中共兰州特支的建立预示着兰州地区的共产党员和广大人民群众在经历了党组织一度不健全的困难时期后又有了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集体,同时也代表党的工作的恢复。新建立的兰州特别支部联合国民党左派等进步势力,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各种革命活动,使兰州地区的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蓬勃发展,党的组织也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不断壮大。

同月,兰州特支在下沟9号召开秘密党员及积极分子工作会议。参会的有农民、商人、学生等农工学商各界代表30多人。会议由保至善主持并作报告,重点强调了开会的意义,保至善说:“……现在敌人已磨刀霍霍,向全国劳动者动手了。我们致力于国民革命,不能坐待灭亡,必须趁早相应的准备,参加战斗。说到党的组织工作,这极为重要,和打仗一样,欲想打胜仗,必须订出正确作战方案,统帅部这调兵遣将,后勤部保障军需,司令发号施令,才能得心应手打大胜仗……”之后,胡廷珍又作了半年工作报告,布置新的斗争方法。他们二人的发言引起了代表们的热烈讨论。在散会之前,保至善和代表们一起演唱国际歌,无声更胜有声的力量在每一个人的心中荡漾。

新成立的兰州特支通过国民党甘肃省党部大力宣传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努力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组织建立群众性的革命团体。不久,青年社、妇女会等群众组织纷纷成立,并以兰州女师为集中地开展活动,保至善和特支的主要成员有时间就去给学生们讲课,与同学们座谈。保至善曾在女师刚进大门第二院的一个坐南向北的教室里,和女教师们谈论民主与科学等问题,当他给大家讲到“德谟克拉西”时,还有人向他解释这个名词。青年社和妇女会的建立,调动了兰州广大青年和妇女的革命热情。并且在城市的各个工厂之中,保至善领导的工会组织也迅速发展。(连载二)



中共创办的第一个外语学习机构

□ 周文洋

1920年8月,陈独秀任书记,杨明斋、李汉俊、李达、沈雁冰、邵力子等人为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以下简称“发起组”)在上海成立。当时,黄浦江两岸人才汇集,各种学术观点纷呈,文化思潮活跃,全国各地追求进步青年纷纷前来,渴望吸纳新知识、接触新思想。李达晚年时回忆说:“五四运动后,湖南、湖北、安徽、四川等地有不少青年对旧社会不满,要求思想解放。这些青年都有一股朝气,想干革命工作,想谋出路,许多人脱离了家庭和学校,来到上海。”

为培养、团结各地来沪的进步青年,给他们提供学习、发展的场所,“发起组”决定利用上海外国租界密布、多种语言汇聚的条件,创办一家外国语学校,以公开授课为掩护,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秘密开展革命活动。

1920年9月28日,邵力子主持的上海《民国日报》登载《外国语学社(以下简称“学社”)招生广告》:“本学社拟分设英、法、俄、日语各班,现已成立英、俄、日语三班。除星期日外每班每日授课一小时,文法课本由华人教授,读音会话由外国人教授……报名费一元,学费每月二元。名额无多,有志学习外国语者,请速向法界‘霞飞路新渔阳里六号’本社报名。”当时,“霞飞路新渔阳里六号”还驻有杨明斋创办的“中俄通讯社”,主要任务是用电报向莫斯科“共产国际”总部传递中国革命消息,也接收“共产国际”电传十月革命后苏联各方面的真实情况,在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创办的《劳动界》周刊,上海《民国日报》等报刊登载。“学社”招生广告虽称对学员收费,但由“发起组”成员和进步团体推荐的学员都一律免费,如:毛泽东以“新民学会”名义推荐的湖南学员任弼时、萧劲光等,陈独秀介绍的安徽学员吴葆萼、蒋光慈等,陈望道介绍的汪寿华、华林等。

1920年11月20日,“学社”正式开班,杨明斋任校长,李达、李汉俊、沈雁冰等分别教授法、英、日语,杨明斋和“共产国际”小组成员库兹涅佐娃讲授俄语。“学社”除提供外语教材,还把《马克思资本论入门》《共产党宣言》作为必修课。萧劲光晚年回忆说:“我读的第一本马克思的书就是外国语学社发的《共产党宣言》,当时读起来很费解,尽管字都认得,但好些术语不明白。书是陈望道翻译的,马列主义课也由他主讲,每个星期讲一课。”学员们除了半天上课、半天自修或做工,还要帮助“中俄通讯社”抄写、油印、校对文稿,为《劳动界》周刊撰写稿件,柯庆施、陈为人、卜士奇等20多位学员先后发表了《失业问题与社会主义》《黄包车夫拉车吐血》等呼吁改变不等的社会现状、关注劳苦大众的文章30多篇。他们同时也组织、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党的“一大”代表包惠僧在《党的“一大”前后》一文回忆说:“当时党的一些公开或半公开的集会,如: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纪念会,纪念‘五一’劳动节、马克思诞辰、‘三八’妇女节等集会都是在‘外国语学社’举行的。”

1921年2月,陈独秀得知苏联将创办“莫斯科东方大学”,他立即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希望接收中国学员入学,同时委托杨明斋在“学社”选拔学员,准备赴莫斯科学习。从1921年4月到7月,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萧劲光等30多名学员,在“共产国际”的协调下,先后分3批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 珍赏 ·

宋定窑白釉弦纹三足炉

□ 李萍清

清乾隆皇帝不但在宫中设置内务府造办处,还制作了大量精美的传世文物,尤其喜欢为陶瓷、玉器及文房器具等题诗,其中有一首对定窑烧造的瓷器发出啧啧称赞:“古香古色雅宜心,宋定名陶器足珍。质温光堪作鉴,纹缕花鸟具传神。攀来掌上掬明月,趣向诗中证旧因。盛得朱樱千万颗,满盘琥珀为生辉。”

武汉博物馆收藏有一件宋代定窑烧造的白釉弦纹三足炉,筒体,平底,马蹄形三足外撇。定窑作为宋代六大窑系之一,是继唐代的邢窑白瓷之后兴起的一大瓷窑体系,有“中国北方白瓷中心”之说,素以生产白瓷著称,兼烧黑釉、酱釉和绿釉瓷,文献分别称之为“黑定”“紫定”和“绿定”。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年),北宋大文豪苏东坡出任定州知州时期,亦极其喜爱定窑瓷,以“定州花瓷琢如玉”来赞美定窑瓷的绚丽多彩。定窑所烧白釉瓷胎土细腻,成品胎质白而有光,观之色如玉,敲之声如磬,纹饰秀美,刻花奔逸,温润恬静。“定州花瓷瓿,颜色天下白。”元人刘祁在《归潜志》中赞美的,即是定窑烧造的白釉瓷。

焚香、烹茶、插花、挂画为宋代四艺,其中熏香除了除臭、驱虫、避秽、防疾之外,还成为文人官绅的雅物,即便是闲坐或小寐,亦要焚香于室。无论是书斋雅舍,还是轩阁凉亭,处处熏香清悠,为生活增添几分情趣。宋代诗人周紫芝笔下的“梦断午窗花影转,小炉犹有睡时烟”,就是宋代焚香大盛的写照,以至于焚香的瓷炉在当时得到大量生产。定窑生产的瓷器器形多是碗、盘、枕、炉、盂等日常生活器皿,其他种类器极少。

这件定窑白釉弦纹三足炉胎质坚致,通体施白釉,釉色牙白,釉泽莹润,具有定窑产品典型的特点。此炉以定窑发明的覆烧法烧制而成,造型简朴,端庄优美,是宋代定窑烧制的一件精品。1960年长沙杨家山南宋夫妇合葬砖室墓出土了一件定窑白釉弦纹三足炉(收藏于湖南省博物馆),另外在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天津艺术博物馆、瑞典亚洲博物馆和美国波士顿美术馆等处,都有同类型的定窑白釉弦纹三足炉入藏,可见宋代定窑烧造了一定数量的此种瓷器。宋代定窑能从民间跻身于烧制官窑用瓷的名窑行列,其工艺的先进和技法的精湛,从这件器物上可见一斑。



· 丝路览胜 ·

陇原三处杜甫草堂

□ 刘志宏

杜甫一生游历栖身之地,散布于全国各地的杜甫草堂大约有40座之多。从有关典籍和地方志可知,陇右地区最著名的杜甫草堂有天水东柯谷杜甫草堂、成县杜甫草堂和徽县栗亭草堂。

天水东柯谷杜甫草堂,位于天水市麦积区甘泉镇柳河村。据史载始建于北宋哲宗绍圣(1094—1097)年间。明代崇祯末年(1644年)毁于兵火后重建。同治七年(1868年)再遭兵毁,毁殆殆尽,之后又加修葺。据《陇上杜祠知多少》载,东柯杜甫祠为秦、陇、蜀、荆、楚、豫等所有纪念杜甫祠中修建最早的一座,可谓天下第一草堂,因此宋代以后被列为天水十大名胜之一。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爆发了安史之乱,为避战乱,杜甫于唐肃宗乾元二年来到了秦州东柯谷,在侄儿杜佐任所之旁结草庐以寄迹,种花木以埋踪,并将此地曾看作是理想的避乱隐居的“桃花源”。诗人在秦州期间所作的《陇右纪行诗》大多是在东柯草堂的作品。当地流传至今的民谣说九股松、八股槐,杜甫草堂、砚瓦台。长期以来,草堂所在地柳河称子美村,学校称子美小学,把旁边的千年老槐——八股槐,称子美槐。

杜甫寓居天水期间,用大量的诗篇描绘了独特的陇右自然风貌,记述了特定历史时代的人文景观,呈现出了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山寺》一诗,是古代诗人中最早咏写麦积山的诗作“野寺残僧少,山圆细路高。麝香眠石竹,鹦鹉啄金桃。乱水通人过,悬崖置屋牢。上方重阁晚,百里见秋毫”。秦州胜景南郭寺则借助杜甫的诗作名扬四方,不少人就是吟诵着“山头南郭寺,水号北流泉。老树空庭得,清渠一邑传”走进陇右的。东柯谷是天水文化发源地之一。“东柯好崖谷,不与众峰同。采药吾将老,儿童未遣闻。”杜甫曾乘船前往东柯谷,途中,意将其地视为陶潜所记之桃花源地,盖欲卜居其处。

成县杜甫草堂,又称杜公祠,座落于县城东南3.5公里处的飞龙峡口,是一组纪念唐代伟大诗人杜甫流寓同谷的祠堂式建筑,也是国内现存三十七处“草堂”中历史最久的一处。

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年)的深秋,安史之乱战火正炽,诗人杜甫从华州弃官西行,经长安,到达秦州。阴历10月间,他又冒着“天寒霜雪繁”,挈妇将雏,辗转来到当时的同谷(今成县飞龙峡)。诗人在飞龙峡的西岸选择了一处背青山巨岩,面对峡谷山峰,避风向阳的山坡地,营建了简陋的栖身草堂。在同谷的一月多时间里,诗人“亲自负薪采松,拾橡为生,儿女饿殍者数人”。在严峻的生活考验面前,诗人先后创作了《龙门镇》《石龛》《积草岭》《泥功山》《凤凰台》《万丈潭》《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发同谷县》等十几首诗作。尤以《凤凰台》和《同谷七歌》为最,与“三吏”“三别”争辉。同年冬11月初,诗人取道东南由栗亭、木皮岭、自沙渡一线,开始了向“喧然名都会”——成都的艰难跋涉。唐懿宗咸通十四年(872年),成州刺史赵鸿在五律《杜甫同谷茅茨》中写道:“工部栖迟后,邻家大半无。青羌迷道路,白社祭杯盂。大雅何人继,全坐此地孤。孤云飞鸟什,空勒

旧山隅。”说明当时故居遗迹尚存。宋徽宗宣和五年(1123年),“秀才赵惟恭捐地五亩,县令谏水郭懋始立祠。使来者美其山川,而礼其像,忠其文”,在杜甫故居的遗址上重修了一座祠堂。乾隆六年(1741年)记载:“子美草堂在飞龙峡口,山带水环,霞飞雾落,清丽可人,唐乾元中子美避难居此,作草堂,有同谷七歌及凤凰台诸诗,后人感其高风,即其址祠之”。后来经过宋、明、清,民国年间几次修建和补葺,草堂才逐步美轮美奂,初现规模。现在草堂内还留存有南宋光宗绍熙四年字文子震刻写的诗碑,明世宗嘉靖九年和十九年立的两座诗碑,及明神宗万历四十七年立的《重修杜少陵祠记》碑石等多处。



成县杜甫草堂

徽县栗亭杜甫草堂位于栗亭川,唐代属同谷县所辖之栗亭镇。栗亭河纵贯南北,两岸地势平坦,良田广布。史称此地“山出珍果野蜜,地产薯芋稻粱”,为陇右不可多得的富庶地域。杜甫早在寓秦期间就已把此地想像成了“虽负旅途远,庶遂平生游”(《发秦州》)的一方乐土。栗亭川距同谷不过一日行程,杜甫一家从同谷东行,经店村、横川而至栗亭。栗亭于元至元六年(公元1264年)归入徽州,今属徽县栗川乡辖地。杜公村在今徽县城西40里的栗川乡杜公行政村,徽成县间公路穿村而过。杜甫约位于杜公村南5里的木皮岭下元观峡内,有一如屋巨石,石面平坦如席,依山傍溪,石面上有一个人的臀部印迹和一对清石的脚窝印迹。后人为了纪念其事,在对岸石崖上呈丁字形凿刻了“宛在中央,少陵约台”八个楷书大字。

杜甫在北宋时期受到文人学子的普遍尊重,陇右地区的这三处杜甫草堂修建的年代都集中在北宋的哲宗、徽宗两朝期间。历经千年的时代沧桑,目前这三处草堂中规模最大的是成县草堂,小具规模的是东柯草堂,而片瓦无存仅留遗迹的是徽县栗亭草堂。徽县栗亭草堂在陇右地区的杜甫纪念祠堂里是出现最早的,但现状是最令人惋惜的。